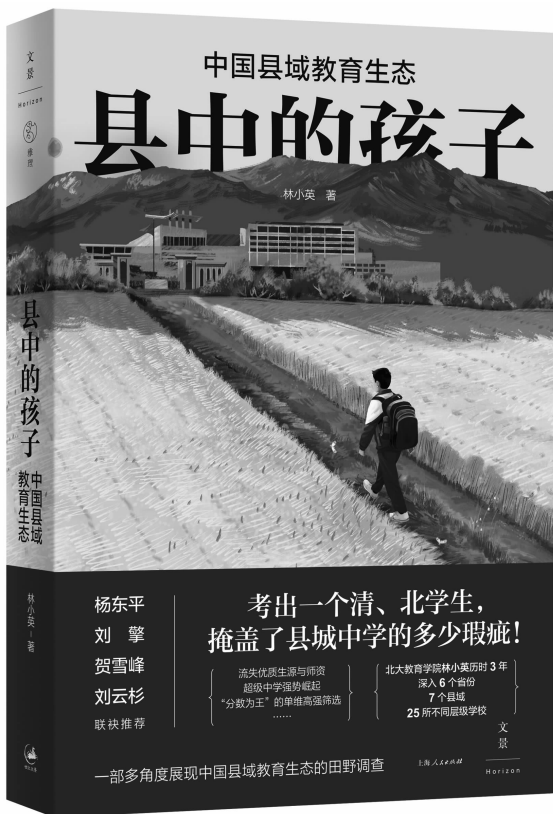


考出一个清北学生,掩盖了县城中学的多少瑕疵 县域教育何以成为一个话题



县中困局在今天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教育热点

读品: 县域教育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为什么县中困局在今天会成为一个教育热点?

林小英: 在全面落实“以县为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后, 经过20多年的生长与定型, 县域教育产生多重魔幻现状, 撤点并校、村里躺平、县里内耗, 追随发达城市精英教育理念, 在“分数为王”的高竞争、强筛选的大环境下, 逐渐沦为被帮扶或淘汰的对象。县域之内和地区之间的学校不断地上演着“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的生源和师资掠夺, 破坏了基础教育的生态, 导致有的地方营养过剩, 有的地方变成不毛之地。县域教育之间的差异扩大, 生源的跨地区流动以及对优质教育追求的同质化和单调化, 造成了一种令人焦虑的局面和生态, 引发关注。

读品: 超级中学的崛起对县域教育的生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为什么说“考出一个清、北学生, 掩盖了县城中学的多少瑕疵”?

林小英: 在以升学为导向的单一教育质量评判标准面前, 生源就成为这个市场中的流动资源, 高考升学率就是市场的价格信号, 生源争夺便是市场竞争行为。处于资源比较优势格局中的“超级中学”向下挖掘优质生源, 掏空资源弱势地区的优质学生和教师, 一层一层把焦虑往资源较弱的地方波及和泛化, 最终对县域教育的生态造成破坏。可对于剩下的孩子来说, 尽管队伍中站在前排的人走了, 他们仍未有机会站在前排被精心对待。当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高考的时候, 很多的问题会被掩盖。

读品: 县中的孩子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什么样的孩子会留在县中就读呢?

林小英: 县中的孩子是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 而这一端中的群体又可以再次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成长阶段。从村小的孩子到县中的孩子要经历多次大面积的粗筛, 每次筛选都将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凸显一次, 从学校庇护圈到各自的家庭和社会圈子能否为孩子提供支持保障, 成为孩子社会化过程的真切体验。处在县域内不能实现跨区域流动的家庭, 其经济状况和孩子的教育状况一路走低, 与此同时, 能够实现跨区域流动的家庭可以凭借经济实力为基础, 为孩子匹配最合适的教育资源。

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 可以说这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的面貌和发展, 他们的命运才是最真实的中国底色。在中产阶级关于教育的焦虑被无限放大的背景下, 这些县中的孩子对教育的需求却时常被忽略。



林小英
博士,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北京大学教育质性研究中心主任

读品: 相比县一中, 县二中又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威胁?

林小英: 近年来, 县二中的生存不断地受到来自民办学校和县一中的双重挑战和威胁。在师资上, 二中的师资不断向县城的一中流动, 一中校长毫不讳言“二中是一中教师的摇篮”; 在招生政策上, 二中的生源经过了“市民办学校—市最好的公立学校—县一中”三轮筛选, 即“最优质的毕业生首先是优先市里的中学, 私立学校先面向全市招生, 这样一招倒逼各个县区效仿; 各县区也这样, 最优秀的放到一中去, 最差的放到其他高中去”。“学生比较少, 再加上本身是教育欠发达地区”, 二中可选择的学生基础相对较弱。

读书升学依然是改变命运的主要出路

读品: 县中的孩子现在还是只有读书一条出路吗? 他们的升学路径是怎样的?

林小英: 对于绝大多数县域学子与家长来说, 读书升学依然是改变命运的主要出路。县域孩子的出路分层与升学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两块: 第一层, 在村小就读的孩子, 本来就是家庭资本较弱的、父母辈已经经过社会筛选后剩下的孩子。第二层, 在镇中心学校就读初中的孩子, 面临城乡分流和普职分流交叠在一起的第二次筛选: 最优秀的学生去城市高中; 次优学生读本县高中; 去了普高的去本县职中、私立民办高中, 或者上“3+2”五年制大专; 个别家庭实在无力提供支持且孩子成绩较差的则直接进入社会。

读品: 县域的教师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 他们就是身在乡村心在城的“打工人”吗?

林小英: 县域教师的日常工作内容与城市教师相比并无太多差异, 但工作所牵扯的精力分配、所导致的状态以及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预期相差较大。“工作量与工资、职称不匹配”, 学校低迷的整体氛围使得这些老师产生了一种另类的“职业倦怠”, 当他们发现努力与成果不成正比的时候, 就会把教学视为一种单纯的谋生工具, 做有编制的打工人。但同样也有一批以教师为志业, 安心扎根于县域的坚守者, 学校应该保护和持续培养的正是这样的老师。

读品: 县域的年轻教师与老教师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 他们是否能为县域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林小英: 县域教师中也经常反映这样一个问题: 越年长的老师钱越多, 越年轻的越少, 这样不干活的钱反而多, 严重挫伤老师的积极性。老教师在评到职称、达到一定年龄后, 便不愿意再持续投入。而对于年轻教师, 他们大多具有师范院校的培养背景, 但同样持有将教师当作谋生手段的想法。虽然他们能够按时按量地完成下派的任务, 也从未出现出格行为, 在面对上级提出的意见时也表现出良好的进步态度, 却很难真正留得住和教得好。

读品: 在县域教育的图景中, 校长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他们如何看待、评价自己的工作?

林小英: 在脱贫攻坚背景下, 乡镇中学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与基层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 不仅要面对经费短缺、生源流失、师资流失、安全事故频发的现实压力, 也在教育扶贫、消费扶贫和定点扶贫等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既是全镇教育事务的管理者, 也是政府体制末端的责任人。他们将自己的工作归结为两类: 正事和杂事。正事就是真正的“教书育人”, 这也是多数校长私下表示的“最想干的事”, 而占据

他们大多数时间的是“杂事”, 这类事情主要是由县域行政系统对校长的考核指标和考核方式所催生的。

他们的工作往往呈现出时间长、任务重、责任大、资源少的高压状态。他们需要凭借个人能力和智慧, 作为当地人所积累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 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精耕细作, 将一些事情“摆平搞定”。

教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 应给人以希望

读品: 县中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虽然从不同的跑道上起跑, 但终究会在高考的赛道上会合, 他们如何理解和面对自己的未来?

林小英: 这些留在县中就读的孩子, 虽然并未担负太多的期待和希望, 但他们也会去审视自己的生活, 检查自己在等级秩序中的位置, 客观而不失深刻, 同时又透出隐隐的不甘与自负。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以后, 不同的家庭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 在孩子降生之时就以一种给定的状态而存在, 这就是县中的孩子们亲眼所见的事实。

读品: 网络能否帮助这一代孩子弭平城乡信息壁垒, 还是进一步扩大了差距?

林小英: 县域的孩子把大多数的课余时间都放在刷手机、看电视和做兼职上, 只有极少数重点班的学生才会有意识地进行额外的学业训练。当一线城市的孩子运用互联网时, 他们更有能力收获我们当下数字化经济和红利。即便县中的孩子有着相同的上网渠道, 但他们也缺乏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形成数字时代的头脑, 无法利用互联网来增加他们的人生机会, 更多的是停留在原地, 享受手机上网带来的没什么营养的网络快餐以及电子游戏所给予的快感。

读品: 县域的家长与城市的家长有何不同? 他们对子女教育又有怎样的期待? 他们如何掂量自己手中的筹码?

林小英: 县域学生家长凭借家庭经济能力、孩子学习成绩或社会人脉关系等“择校资本”, 让孩子到市里优质学校或承诺学费优惠好处的民办学校就读, 择校资本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离场能力”。与城市的家长相比, 县域家长在进行教育选择的过程中, 并不会执着于追求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而是基于孩子的学业成绩, 想方设法地寻找最能孩子提供相对优势的教育资源。他们对孩子的期望是别重复自己的身份与地位, 通过获取高学历来找到一份赖以生存的工作, 并以此在社会上立足。

也有家长宁愿让孩子未来考入本省的高校即可, 因为他知道, 孩子将来还能回到本县工作, 相比那些考入“985”“211”的院校, 毕业后远在一线城市工作的人而言, 他们回到本地工作做公务员, 可以照顾一家人甚至一个家族的人, 也可以得到家里更多的照顾。这种权衡很现实、很可行, 然而这种过于实际的眼界算不算一种自我设限?

读品: 理想的县域教育是怎样的? 应该具备怎样的原则? 实现怎样的目标?

林小英: 回到教育常识, 恢复教学常规。劳逸结合, 不过分地压榨学生。学校要尽可能多地满足教育需求, 尽量无须家长补充额外的资源, 在高中阶段给学生提供完整的文理通识教育。学校本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联结的一个场所, 应赋予孩子一生中重要的情感资源。教育不应奉行适者生存的模式, 教育的结果也不应以经济逻辑来衡量和验证, 教育是在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互动中完成的, 情感和关系的养育也是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县中, 江苏人眼里“永远的神”。每年七八月份, 省内知名县中的高考战绩如何, 今年又上了几个清华、北大, 是当地乃至全省家长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甚至有不少家长让孩子回老家县中读书, 重走自己走过的升学之路, 原因是城里“太卷”。

然而, 在江苏县中“群峰现象”之外,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所著的《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描述了这十多年来县中走向衰弱的另一番景象——

城镇化带来的更加频繁的人口流动、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政策许可下的跨区域招生, 不少地级市中学、省会中学凭借优越的办学条件、充足的教育资源, 快速吸引全市甚至全省的优质师生资源。不少民办中学也凭借灵活的招生手段和强有力的激励措施, 迅速打造升学品牌。原有的招生格局重新洗牌, 县中往往成为弱势一方, 优质生源大量流失。

尤其是许多地区出现的“超级中学”, 不但规模庞大, 还通过层层掐尖, 打造“北清率”“重本率”的升学品牌, 源源不断吸引新生。有条件择校的家长, 趋之若鹜把孩子送往这些中学。县中衰败与生源流失形成了互为因果关系: 县中加速衰败, 生源加速流失。

调查发现, 欠发达地区县中普遍很难留住中考前100名尤其是前50名的学生。曾是县域内学子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主要平台的县中, 竟沦为“被鄙弃”的对象。

经过现代教育系统一层又一层的筛选和过滤, 滞留县中的, 往往是成绩中等及偏下或家庭困难的孩子。他们的特征由此以群体化方式凸显, 贫困、辍学、就业难等语汇就这样形成了固定的联结, 在县中孩子的生活里交替出现。

最终, 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的结果, 县中的孩子就像是一群“剩下的孩子”, 在普遍以城市精英教育为标准的系统中, 被挤向学校的边缘、社会的边缘、期待的边缘。

但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 他们的命运才是最真实的中国底色。换种角度看, “县中的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正如林小英所说, 当我们凸显县域教育、县中孩子的问题时, 又会让另一群人不平衡——谁来关注那些县二中的孩子、县三中的孩子、县中的女孩子? 当城市中产的教育焦虑充斥社交媒体时, 会发现县域教育的结构跟城市教育的结构其实也差不多, 城市里一样有精英中学和普通中学, 普通中学的孩子的处境就一定比县中的孩子更好吗? 所以, 不妨将“县中的孩子”当作一种处境去理解, 那么我们会更有代入感, 因为我们都有可能碰到这种“被剩下”的处境。“教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 经济越落后的地方, 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